

犹太政治研究概览

“哈吉·阿明·侯赛尼，纳粹与大屠杀：合作的原因、本质和后果”

2015年12月26日

作者：杰弗瑞·赫尔夫（Jeffrey Herf）

翻译：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翻译硕士 陈亚地 王甜甜 李军 董寒冰 俞晨飞

审校：SIGNAL 关媛

摘要

2015年秋，巴勒斯坦政府称伊斯兰国对耶路撒冷的阿萨克清真寺造成了威胁，公众视线再次聚焦到了哈吉·阿明·侯赛尼（Haj Amin al-Husseini）的身上。前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曾在二战前夕和二战爆发后与纳粹德国合作，曾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领导人。

一些历史学家，就连以色列总理都认为侯赛尼在欧洲大屠杀中起了重大的决定性作用。本文通过研究大屠杀的决策制定，证明侯赛尼并没有影响希特勒屠杀欧洲犹太人的决策。

但从他发表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期间的演讲和文章中，可以看出侯赛尼的重要历史作用。这些演讲和文章充分证明了在二战和大屠杀期间，侯赛尼对纳粹德国针对北非和中东阿拉伯语宣传的影响。

侯赛尼 1941 年至 1945 年在柏林生活之前、期间和之后的时间里，将伊斯兰教的本质解读为反犹太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并将这一解读与现代欧洲历史中的反犹阴谋论结合起来，在重塑伊斯兰教的政治传统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一、大穆夫提（侯赛尼）与纳粹德国的合作：定义历史问题

哈吉·阿明·侯赛尼（1897-1974）与纳粹德国合作广泛，但是并没有影响到纳粹决定最终如何解决欧洲犹太人问题。大屠杀期间，他确实在纳粹德国对阿拉伯国家的阿拉伯语宣传中影响深远。他所遗留下来的反犹太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仍然影响着巴勒斯坦和阿拉伯的政治。想要了解侯赛尼在中东政治和思想史上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划出一个清楚的界限：一方面，侯赛尼是很重要的宗教领袖和纳粹宣传家。他正是利用这一权利煽动残害犹太人，是导致种族灭绝的关键所在，所以根据当今的国际法，他的行为可视为犯罪；另一方面，他却并没有参与导致大屠杀的决策制定。本文目的就是通过有依据的史料来证明上述观点。

2015年10月20日，在耶路撒冷举行的第37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发表讲话称：哈吉·阿明·侯赛尼说服希特勒将反犹政策从强制移民转变为灭绝政策。所以最近穆夫提的历史责任问题成为大众争议的焦点。内塔尼亚胡先是发表错误的声明，说侯赛尼是“大

屠杀方案的重要构造者之一”，但随后他又收回了这句话。这里很有必要指出，权威的历史学家认为在大屠杀的决策席中并没有侯赛尼的参与。他们的研究表明，就算 1941 年侯赛尼没有去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大屠杀依然会发生。

从 1921 年上任为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到 1948 年第一次阿以战争期间担任巴勒斯坦人的领导人，侯赛尼一直是巴勒斯坦民族运动的领导人。1948 年战败后，他的政治道路开始走下坡路，但是他一直拒绝对以色列做出任何妥协和让步，这也在持续影响着巴勒斯坦政治思想。侯赛尼称犹太复国主义是对阿拉伯人和伊斯兰地区的威胁，而且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后来的以色列人会摧毁或清除耶路撒冷的阿萨克清真寺。二战和大屠杀期间，侯赛尼被英国人驱逐出中东地区，在希特勒统治的德国找到了避难所。他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与他对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的热忱是密不可分的。然而，侯赛尼并没有影响希特勒做出解决欧洲犹太问题的大屠杀方案的决定。

然而，如果有人夸大侯赛尼对欧洲形势发展的重要影响，也必然会低估他与纳粹合作的深度及其政治信念和宗教信仰的深层原因。侯赛尼在希特勒和纳粹那里找到了意识形态方面的精神伴侣，即对犹太人、犹太教和犹太复国主义共同的深仇大恨。早在 1933 年他就对耶路撒冷的德国外交官表达了这种热忱。在与德国外交官的秘密谈话，以及 1937 年在叙利亚的一次公开演讲中，侯赛尼很清楚地表达了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反对深深植根于他对伊斯兰教的解读中。侯赛尼在政治和思想史上的重要性，体现在他将自己对伊斯兰教的解读与阿拉伯民族主义及反殖民主义融合在了一起。

在他阅读古兰经以及经文评注中，伊斯兰教天生反犹，并且与犹太教和犹太教众都是敌对的。他是传统意识形态激进伊斯兰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而这种激进伊斯兰主义延续至今，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其起源于逊尼派穆斯林兄弟会，随后出现的基地组织、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斯兰国等组织都是在后者激励下产生的，也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什叶派分支。抛开差异不说，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伊斯兰教天生反犹、反民主，认为针对犹太人、基督教徒和对伊斯兰教持不同观点的穆斯林等“不信教者”和“异教徒”实施恐怖主义有理。称其为“伊斯兰主义者”正是因为从《古兰经》、《古兰经评注》和《穆罕默德言行录》中选摘出部分关键文本。当然，这只是对伊斯兰教的一种解读，看似合理或曲解了伊斯兰教的典籍，如果没有这些典籍的话，也不会存在。

二、侯赛尼的伊斯兰教主义信息

侯赛尼的首个经典《伊斯兰教和犹太人》于 1937 年 9 月 8 至 9 日在叙利亚布鲁丹（Bludan）举行的阿拉伯政治会议上发表。这是他到纳粹德国的四年前，当时他还没有依靠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这一讲话表明他带到德国的伊斯兰教主义信息是他自己信仰的产物。1938 年，纳粹一家出版社发表了他讲话的德语版，其便成为伊斯兰教主义传统的基础典籍，也是将伊斯兰教定义为反犹根源的基础典籍。直到 1938 年，纳粹政治精英才能读到侯赛尼的信息。阿拉伯语版本同时也在中东发行。正如以色列历史学家兹维·艾普莱格（Zvi Elpeleg）1993 年在侯赛尼研究中提到的，在《伊斯兰教和犹太人》一文发表后，与会的 400 名在叙利亚的代表将侯赛尼选为泛阿拉伯组织的名誉主席。

侯赛尼当时正在躲避英国的逮捕，所以该文是在他不在场的时候读的。他写道：

穆罕默德从麦加逃亡到麦地那，犹太人与伊斯兰教的战争便开始了……犹太人现在的方法与之前的别无二样。就像如今，诽谤是他们的武器。他们说穆罕默德是骗子……他们试图破坏他的荣誉……他们开始问穆罕默德一些愚蠢和无法回答的问题……然后他们试图毁灭穆斯林。正如犹太人曾经会背叛穆罕穆德一样，他们今天也会背叛穆斯林……《古兰经》和《穆罕默德言行录》证明犹太人是伊斯兰教的死敌，并且要摧毁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典籍中确实有反犹段落，但侯赛尼着重突出和夸大了这些段落的含义，进而将伊斯兰教定义为天生反对犹太人的宗教。他参与了历史学家和文学研究者所称的选择传统行为，即，根据当前时代关心的问题而去选择性的解读典籍。如果原有典籍没有相关材料的话，是不会发生这一现象的。古老典籍使得侯赛尼对古兰经的解读获得了合法性和权威性。

1947年6月，美国情报局的报告显示，侯赛尼“曾答应出示书面证明，反驳他‘犹太人宣称的所谓支持轴心国的活动并自证清白’，但他最终没有这么做。为表明美国将其列为战犯的行为不合事实，侯赛尼撒谎称在柏林无线电讲话中‘从没有说过反对美国’”。

美国和英国都没有对他提起诉讼。南斯拉夫政府本来要控告他，因为他曾推动成立了波斯尼亚党卫军部门，但最终也没有实行。没有了遭起诉的压力，侯赛尼和他的拥护者更容易模糊他们与纳粹德国勾结的证据，或者将勾结归因于受投机主义蛊惑而非出于意识形态信念。直到2009年，《纳粹眼中的阿拉伯世界》一书发行，记录了侯赛尼和纳粹的最重要合作，才让人们知晓这一事实。

同时，此书还证实了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侯赛尼便竭力让阿拉伯-以色列冲突演变成穆斯林-犹太人的民族冲突，强调假设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对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的处理。若按照对待狄特里希的标准对待侯赛尼，那么他在纳粹德国中扮演的角色本应让他遭到反人类和种族大屠杀指控。

三、 种族大屠杀决策中侯赛尼作用不大

与巴里·鲁宾（Barry Rubin）和沃夫冈·施万尼茨（Wolfgang Schwanitz）近期著作《纳粹、伊斯兰教主义者以及现代中东的形成》所述相反，希特勒1941年决定在欧洲实施犹太人大屠杀时，侯赛尼并没有在其中发挥作用。但可以确定的是，上世纪30年代侯赛尼在巴勒斯坦以及1941-1945年住在柏林的时候，侯赛尼是向柏林施加压力，更早时还向英国施加压力，防止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继续移民的阿拉伯领导人之一。

最早的时候，侯赛尼的观点和行动便记录于公众眼中，纳粹政权内部也都知道。但1941年，侯赛尼还不是纳粹政权中的高级官员，也不是决策者，而是一个寻求政治庇护的难民，一个生命和自由全由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说了算的人。意大利和德国都能帮他逃避英国在中东地区对他的搜捕。他并没有处于能够

影响他“恩人”对欧洲犹太人命运的决策。他与希特勒、纳粹党卫军头目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德国外长里宾特洛普（Joachim Von Ribbentrop）、纳粹党卫军犹太事务专家艾希曼（Adolf Eichmann）都曾有过会面，主要讨论三件事：第一，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努力赢得战争，在北非和中东地区进行阿拉伯语宣传；第二，纳粹政权多番努力，成功在欧洲东部战线与国防军（纳粹德国）的争斗中获得上万穆斯林支持；第三，恳求阻拦大屠杀期间犹太人从欧洲移民到巴勒斯坦地区。

侯赛尼在希特勒决策时能够施加影响这一观点出现的原因，部分由于对这两人 1941 年 11 月 28 日柏林会面的错误解读。希特勒愿意会见侯赛尼，原因在于在柏林大家都知道侯赛尼憎恶犹太人和英国人，对纳粹怀有满腔热情。官方描述会面场景如下——德国军队从高加索向南挺进时，希特勒对穆夫提(伊斯兰教教法权威)说道，“德国的目标就是摧毁居住在英国庇护下的阿拉伯国家的犹太民族。那时，穆夫提将成为权力最大的阿拉伯世界发言人。秘密筹措阿拉伯活动也是他的任务。”

希特勒也提到“完全摧毁欧洲犹太-共产主义帝国”，这也是他对其在欧洲反犹太政策的典型模糊和凶恶描述。会面时，希特勒明显表现出希望将侯赛尼列入扩大包括北非和中东犹太人在内的屠杀政策计划中。侯赛尼的重要性还在于他在将犹太人大屠杀运动扩大到欧洲之外出了力。这样的扩大是纳粹信仰的逻辑后果，这种信仰认为存在全世界的犹太阴谋，因此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对德国构成威胁。这一政策在纳粹政权的极端反犹太主义运动中是一以贯之的，并不需要侯赛尼或战时柏林的其他阿拉伯合作人士的额外助推。但是这与侯赛尼竭力防止在巴勒斯坦境内建立犹太国家密不可分。因此，他的合作既是出于双方政治利益考量，也是意识形态上的契合。

四、导致大屠杀的决定和学术文献

侯赛尼在大屠杀决策中作用并不大，这一点能够在有关历史文献中得到确认。即使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人大举进攻苏联之前，希特勒曾给与他副手 Reinhard Heydrich 互相保持通信的 Heinrich Himmler 下达命令。而 Reinhard Heydrich 又命令纳粹党卫军特别行动队的头目杀死苏联攻陷区的犹太人。大规模屠杀于 1941 年 6 月 22 日后立刻开展。1941 年 8 月中旬，杀手人数扩大到包括命令警察营的人，奉希特勒命令，Himmler 将大屠杀政策衍生到包含犹太小孩。按照 Jürgen Mattäus 所写的文章，“在被占领苏联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已经成为现实。”

在此过程中没有进一步升级能够想象。那也意味着所有犹太人，不论性别、年龄、职位甚至行为如何，都全部被消除了。。这也直接导致了整个犹太人社区的毁灭和大面积的“去犹太化”。（对纳粹官员）来说问题不再是为什么犹太人应该被杀死，而是他们为什么不该被杀死。1941 年 6 月-12 月，纳粹党卫军特别行动队和命令警察营共谋杀了约 70 万东部前线的犹太人。大多数受害人被枪杀，也有一些被毒死于新建的移动瓦斯大货车中。就在希特勒于柏林会见侯赛尼的六个月之前，希特勒对生活在苏联的犹太人的政策就已经从 1933 年开始的迫害政策转为灭绝政策。

而究竟何时希特勒决定灭绝欧洲的所有犹太人，这个问题是许多学者关心的话题。1991年，历史学家 Richard Breitman 发布了一篇名为《种族灭绝的缔造者：Himmler 以及大屠杀方案》的文章，他写到，在西欧所获得的军事胜利给了希特勒和 Himmler“以信心在苏联即将来临的战役中去实施原本计划在 1941 年春天进行的屠杀行动”。Breitman 将他的结论总结如下：

到 1941 年 3 月，最终解决方案仅仅是时间和时机的问题。这个时间比大多数专家预选的都要早数月，但是证据十分明显。希特勒拒绝了其他更温和的方案（迁居马达加斯加岛方案、绝育方案）。他早已通过了清除计划——清除在德国和波黑-摩拉维亚的犹太人（最少）。Heydrich 已经开始就特别行动队和苏联进行谈判。纳粹党卫军德意志主要安全部门已经将“犹太专家”送往欧洲其他国家，为驱逐做准备。

数月前波兰犹太人出境已遭禁止。关闭的犹太社区和工作营成为轻松处置波兰境内犹太人的地方。在希特勒保证清除所有波兰境内的犹太人的时候，艾希曼（Eichmann）曾说将犹太人“最终疏散到”波兰。一个月后，Himmler 提到他给 Otto Globocnik 的一项新任务。在波兰灭绝只是个技术问题。因此，那番争论并不只在于希特勒的说辞。

所有这些来源都没有完整叙述所有的事情；没有完美无缺的现代蓝图，但是他们都是独立的来源，在准备打苏联期间又统一形成了深远的计划和基本的决策。正如希特勒 1940 年 12 月告诉 Hans Frank 的：“胜利后，我们要更快地绑定舵柄。”当然，计划在实施之前都是空话，但是要让这一过程不按既定轨道进行，就会发生政治或军事震动。

据 Breitman 说，那种震动并没有发生。他认为，就在希特勒会见侯赛尼的六个月前，大规模谋杀苏联境内的犹太人只是接下来会在全欧洲上演的大屠杀的第一阶段。

历史学家曾主要关注希特勒意识形态动机、除去所有极端反犹太主义和近似偏执的国际犹太人阴谋论，他们认为希特勒“早期的决定就貌似是最后的结论”。因为 1941 年夏秋时节，希特勒公开或私下的发言都表明他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解释就是反犹，这也是他决定大屠杀的决策核心。希特勒曾在 1939 年 1 月 30 日，发表了著名的“预言”演说。他说道，“世界上的犹太人，不论欧洲内外，应该再次发起一场世界大战，最后世界不会是布尔什维克化，犹太人不会胜利，而是欧洲犹太种族灭绝。”

按照希特勒、戈培尔和其他纳粹领导人的观点，1941 年夏天发生的事件似乎印证了这种阴谋论的真实性。德国 1941 年 6 月攻入苏联后，英苏开始联盟。8 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大西洋公约中发表联合声明，决定借贷帮助大西洋对岸的英国。在纳粹领导人的演讲和政府宣传中，他们将这解释为犹太人确实控制着世界的阴谋论。反对希特勒联盟的出现，对希特勒来说，也印证了他极端反犹太人的正确性，也是作为从这些方面解释当时世界政治的一种方法。随着“全世界犹太人”想要对德国发动战争，希特勒认为这将是灭绝性的，作为回击，他也会“灭绝

欧洲的犹太民族”。希特勒的这些认识与纳粹独裁政府高层紧密相关。这一点也在 1919 年以后的言论中有所体现。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克里斯多夫·勃朗宁一直主导撰写导致大屠杀这一决策的历史，他认为布莱特曼提议的决定日期要“晚”一些。他在一系列作品中都这么主张。《大屠杀的起源：纳粹的犹太政策进化史，1939 年 9 月-1942 年 3 月》于 2004 年由大屠杀纪念馆和内布拉斯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勃朗宁主张观点的顶峰作品，记录了党卫军特别行动队的极端大屠杀政策，以及 1941 年 7 月中旬至 8 月中旬苏联境内其他德国杀人军队犯下的罪行。那时，希特勒和德意志军方领导层认为将在 1941 年秋季到来之前打败苏联。勃朗宁总结道，“7 月中旬的胜利喜庆”，也就是希特勒相信纳粹德国很快会战胜苏联不仅标志着“苏联犹太人大屠杀结束，也标志着希特勒发起全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的开始。”众所周知，7 月 31 日，海德里希（Heydrich）在戈林（Herman Göring）那里拿到签字后的命令文件——他被授权开始做必要准备，实现德国辖区的欧洲犹太人全部灭绝；他也要上交一份灭绝全部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

勃朗宁总结道，1941 年 8 月到 10 月，纳粹开始修建犹太人集中营，也就是臭名昭著的灭绝营，纳粹将其奉为屠杀的最佳手段。灭绝营相较于大规模射杀有如下优势。第一，将减少杀手的心理负担。这是在党卫军特别行动队和警察营里出现过的现象。那年夏天，有些杀手在想平民大规模反复射击后不堪压力而精神奔溃。第二，集中营也保护了犯罪的私密性。在东部战线，射杀场面过于公开。第三，正是因为这些地方大多隐藏在公众视野之外，修建毒气室和工业火葬场才能实行。勃朗宁认为纳粹发明集中营的时间发生在 1941 年仲夏至仲秋期间。

勃朗宁报告说，1941 年 8 月俄罗斯战线的党卫军特别行动队领导人与从事安乐死项目的专家见面，这些专家经常用毒气谋杀身体残疾和精神病患者。沃尔特·劳夫是党卫军帝国安全主要办公室的高级军官，他负责监管装有从封闭卡车取来的一氧化碳的汽车运输，他们将战俘锁在毒气车里，让他们中毒身亡。九月上旬，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鲁道夫·胡斯在集中营的封闭地下室试验性使用新研制的麦克隆 B 谋杀俄罗斯战俘。10 月 1 日，德国计划在比克瑙修建第二座集中营。10 月末，德国 Topf and Sons 公司的工程师 Kurt Prüfer 设计并承包修建更大的新焚化炉，正好满足了扩建集中营的需要。10 月中旬，希姆莱批准在贝尔塞克修建集中营。与此同时，切尔姆诺也开始修建类似的集中营。勃朗宁写道：“毫无疑问，随着集中营由构想，到实验，再到建成，纳粹体制里的其他人开始从他们党卫军特别行动队中同事那里收到明确的信号：纳粹对待犹太人的政策将是致命性的。等待欧洲犹太人的是大屠杀而不是驱逐出境。”1941 年 10 月 23 日，纳粹德国正式宣布禁止犹太人从欧洲移民。1941 年 9 月中旬，希特勒批准将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驱逐到德属占领地波兰。10 月 15 日，第一波德国犹太人经铁路被运到了波兰的罗兹犹太人区，随后布拉格、卢森堡和柏林的犹太人陆续被驱逐出境。截至 11 月 5 日，共有 20 多辆运输车将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运往东部。

勃朗宁承认在 10 月之后的几个月里，“屠杀犹太人的任务在方方面面都难以下决定，如何、何时、何地实施屠杀？是否一网打尽。”最晚于 10 月末，“纳粹政权跨越了关键性的分水岭。”最晚 1941 年 10 月，希特勒做了一个根本性的决

定，从在东线战场驱赶和谋杀犹太人转变为实施灭绝欧洲犹太人的计划。希特勒首先与希姆莱交流了这一决定，然后是帝国安全主要办公室的海德里希，最后是那些设计和修建集中营以及制定必要方法的官员。无论我们选择布雷特曼提出的“早期”决定，抑或勃朗宁解释的“后期”决定，两个历史学家将由驱逐犹太人到灭绝犹太人的政策转变，追溯到希特勒会见侯赛尼提前一至八个月之间，而侯赛尼于1941年11月抵达柏林。在这些历史重建中并没有出现侯赛尼和追随者的名字。

历史学家克里斯汀·格奥尔格辩称，12月7日至14日之前，希特勒还没有决定灭绝欧洲犹太人。他断言，尽管驱逐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于11月开始，但那时并未实施谋杀他们的政策。他回顾了上文提到的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发表的“预言”演讲。1941年12月11日希特勒在德意志共和国国民议会美宣战，之后欧洲战争演变为一场国际战争。“这样一来，希特勒1939年设想的情形变为了现实。希特勒为他的反犹世界观构建了一套完整的逻辑，然后宣布他灭绝所有欧洲犹太人的决定。”1941年12月12日，希特勒在柏林举行的纳粹党全国领袖和郡领袖会议上发表讲话。戈培尔将希特勒的演讲总结到了他的日记中，当时希特勒阐释了“犹太人”所谓的反德战争和他决定灭绝欧洲犹太人之间的联系。

有关犹太人质疑希特勒是否决定尽释前嫌。他对犹太人预言道，如果犹太人再一次发动世界战争，他们将全部灭亡。这些并不是恐吓之词。世界战争迫在眉睫，因此灭绝犹太人势在必行。面对灭绝犹太人这一事实不容任何怜悯情绪。我们对自己的德国同胞而不是犹太人抱有同情心。在东线战场上我们又一次牺牲了16万德国同胞，我们要让对此次流血冲突负责的人付出生命的代价。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期间，被纳粹称为犹太敌人的纳粹宣传者和希特勒决定灭绝欧洲犹太种族之间的联系，一直是他们公开宣传的核心内容。针对这一课题一些史学家提出了最新决策点，格拉赫对此表示支持，但他同样也将注意力集中到纳粹领导人身上，如赖特曼、勃朗宁、弗里德伦德等其他领导人，包括希特勒和党卫军帝国安全办公室的主要高级军官，可以肯定的是格拉赫受到了戈培尔的鼓舞。在他的叙述中并没有出现侯赛尼的名字，这仅仅是因为侯赛尼在德国政府决策过程中并没有起什么作用。

如此一来，即便像格拉赫争论的那样，希特勒最终决定灭绝欧洲犹太人是在1941年12月，而非像赖特曼认为的是在春季，或是勃朗宁认为的在8月至10月之间。所有的这些争论都未能说明，穆夫提以及他1941年11月28日在柏林会见希特勒与希特勒最终决定灭绝欧洲犹太人有任何因果联系。这些史学家就某一基本时间点达成了一致，那就是当时希特勒做出了大屠杀的关键决定，并在希姆莱的党卫军帝国安全办公室的官员中交流传播。在这个决策过程中侯赛尼从未起到过重要作用。希特勒近乎疯狂的认为，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正谋划向德国发起一场灭绝战争，从而导致希特勒决定谋杀欧洲的犹太人。希特勒手下的核心极端主义分子，包括戈培尔和希姆莱都这样认为。但是，希特勒本身就是一名极端分子，因此不需要其他人鼓励将其长期以来对犹太人的憎恨转变为一种政策来谋杀他们。尽管侯赛尼或许告诉过希特勒和纳粹政体的其他官员，他同意他们对待犹太人的政策，但他丝毫影响不了希特勒的决策。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参与过有关如何处置犹太人的决策。按照希特勒发动事件的时间顺序，可以看出他出于个人原因做出了决定。正如研究大屠杀决策过程的主要史学家所阐述的那样，无论

希特勒是在春季、夏季、秋季或是 1941 年冬季早些时候决定处决犹太人，他都不需要侯赛尼催促他将驱逐犹太人的政策转变为灭绝犹太人的政策，还有他与侯赛尼见面也不是影响其决定的因素。大屠杀的根本原因在于希特勒对于犹太人深深的偏见和仇恨。总之，英国在侯赛尼从德黑兰去往柏林的途中捕获了他，因此他从未到过战时的柏林，即便是他到过战时的柏林也不会对屠杀欧洲犹太人的历史产生多大影响。

五、 鲁宾和斯瓦尼兹的看法

然而，在他们的研究，也就是《纳粹，伊斯兰教徒以及现代中东的形成》(2014)一书中，巴里·鲁宾和沃尔夫甘·斯瓦尼兹忽略了关于大屠杀决议以及侯赛尼与纳粹合作的现有研究，间接导致他们夸大了穆夫提对于纳粹政策的影响力。他们将一系列时间上巧合的事件解读成了有因果关系的连锁反应。比如说，关于希特勒 1941 年 3 月 11 日阻止犹太人从欧洲移民的讲话，他们写到“截断犹太人的逃跑路线，阻拦所有移民的替代方法，侯赛尼使‘最后决策’成为了不可避免的选择。”然而事实上一些犹太人的移民活动一直持续到了 1941 年的夏天。自从 1933 年初纳粹统治德国起，侯赛尼就一直催促纳粹德国阻止犹太人迁向巴勒斯坦。其他因素也发挥了作用，尤其是希特勒个人的思想信念。然而到 1939 年 9 月以后，碍于战争与英国海上军事力量，欧洲犹太人的大放逐对于纳粹而言则变成了一个不切实际的“解决办法”。如上文所提到的，希特勒的犹太阴谋论导致犹太人在世界范围内遭受种族大屠杀，这想法并非侯赛尼灌输给希特勒的。而关于希特勒 3 月 11 日（1941）许诺阻止犹太人移民，斯瓦尼兹和鲁宾则写到“德国不可能驱逐犹太人，只有屠杀他们”但是我们并没有根据去推断在 1941 年 6 月苏联攻入德国之前，是因为犹太人不可能被撤出欧洲，所以“只有屠杀他们”。先前的迫害政策而非种族灭绝一直持续了下来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可能。然而即使布莱特曼是正确的，早期措施已经实施，也没有证据表明这是因为侯赛尼的影响或建议。我们要知道在 1941 年 6 月，他并不是国家的统帅，而是流亡的难民，他当时甚至不在德国，而是在从德黑兰逃往意大利的途中，隐匿在英国。关键的一点是，拥有决策权利，推动各项政策实施的人一直是希特勒，而非侯赛尼。

鲁宾和施瓦尼兹在谈到 1941 年 11 月 28 日侯赛尼会见希特勒时，他们将先后发生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并认为其中具有因果联系。他们写道，1941 年 11 月 29 日，希特勒“命令海德里希在十天之内组织召开会议，准备就‘如何处置犹太人的问题商讨出最后决定’。听了侯赛尼的反犹言论和铲除犹太人的决心，希特勒便做出了灭绝犹太人的关键抉择。”当然，希特勒会很开心，他有一位阿拉伯裔的支持者和合作者。但事实上，在希特勒和侯赛尼 11 月 28 日会面后的几天，希特勒命令海德里希发出邀请召开万湖会议并不能说明侯赛尼对希特勒的决定产生过任何影响。相反，更切合实际的一种解释为，11 月 28 日两人会面后，早已决定谋杀欧洲犹太人的希特勒想告知侯赛尼，他要将屠杀犹太人的政策扩展到北非和中东地区，而且欧洲战争应根据其预期和计划继续。根据布雷特曼和勃朗宁的作品，二者都认为希特勒决定召集德国各政府首脑开会，告知其有关犹太人的最终决策应早于 1941 年 11 月 28 日。

六、 穆夫提作为区域领导人和轴心国宣传者的重要性

就像史学家对侯赛尼的了解以及鲁宾和施瓦尼兹提到的那样，穆夫提与柏林主要是通过德国外交部官员联系，包括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外交部对外宣传办公室以及海因里希·希姆莱和党卫军帝国安全主要办公室的官员。但是，从希特勒 1942 和 1943 年的主要演讲中可以看出，这些年穆夫提对第三帝国的作用主要在于，他在北非和中东宣传纳粹政策，因为他最关心也最了解这两个地区。纳粹利用德国档案、美国国务院文件以及美国情报机构宣传阿拉伯世界，通过提供最全面的阿拉伯语文件广播。此外，纳粹还在二战期间向阿拉伯国家印发传单。侯赛尼在这些广播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包括他的即兴广播和有文本广播。因为隆美尔的德意志非洲军团威胁要于 1944 年再一次在阿拉曼推翻英国，占领埃及，捕获在巴勒斯坦建国的犹太人，所以 1942 年夏季，侯赛尼通过广播煽动处决犹太人而获得了国际知名度。1944 年 3 月 1 日，为了回应美国国会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侯赛尼通过阿拉伯语广播为德意志做了以下声明。

茂塔戴尔（Motadel）写道，前期对侯赛尼的传记研究可能高估了其对柏林的影响。他的最终影响非常有限。他曾计划取得实质性的妥协、切实保障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的独立，这一基本主张失败了。他的提案中，仅有符合德国利益的部分得到顺利实施。最典型的例子是他曾插手阻挠犹太人从德国东南部欧洲附属国迁往巴勒斯坦。更确切而言，侯赛尼不是事件重心所在，而是德国针对伊斯兰世界政策的一部分。必要时，德国官员将其塑造为宣传形象。他月薪超过 9 万马克，他与追随者享有若干套住房。

侯赛尼数额巨大的月薪说明，他和追随者受到纳粹德国的高度重视。当时每月 9 万马克是一笔财富。Adam Tooze 在纳粹经济研究中写道，1936 年“德国全国范围 62% 的纳税人年收入不足 1500 马克。”21% 的纳税人年收入为 1500 至 2400 马克。“仅 17% 的纳税人年收入超过 2400 马克，即每周 50 马克。”当时的德国经济，只有最富有的人才能拿到 9 万马克的月薪。这笔钱用于侯赛尼奢华生活的开支和大批政治追随者的支出。侯赛尼虽然对纳粹政治决策方面影响有限，但是对纳粹德国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942 年 12 月 18 日，在位于柏林中央的伊斯兰研究中心开幕式上，德国外交部选定侯赛尼做主要演讲。研究中心此前已关闭多年，在德国外交部的支持和管理下得以重新开放。侯赛尼的演讲经过外交部长 Joachim von Ribbentrop 的认可。演讲主题与他曾在布鲁丹的演讲相呼应，融合了纳粹宣传的主要思想。德国（欧洲德语地区）和北非及中东的阿拉伯地区都转播了此次演讲。德国媒体也进行了重点报道。他在演讲中强调二战期间纳粹宣传的核心思想，并指出犹太人大屠杀的起因是犹太人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由世界上的犹太人引发，穆斯林人如果能够恰当利用这次机会，就能免受迫害和压迫，这样的机会百年难得一遇。”正如侯赛尼在演讲中对 1937 年叙利亚事件的表述，他重点陈述了个人对伊斯兰地区的见解，煽动对犹太人的憎恨情绪，称犹太人是“传统选择的结果”，具体如下：

犹太人及其同谋是穆斯林的世代死敌，他们有史以来就充满敌意、无处不在、背信弃义、狡诈多端。……古兰经和先知的传记能充分证明：犹太人品性残缺、心怀恶意、虚伪狡诈、行为不端，这就足以警示穆斯林，直至末日也要警惕犹太

人的威胁和敌意。而且伟大先知在世时就有犹太人，因此犹太人得以存活几个世纪，他们一有机会就针对穆斯林实施诡计并充满敌意。

侯赛尼还说，英国和美国谴责对北非穆斯林土地的入侵，布尔什维克谴责对穆斯林的迫害。这一关键信息再次说明了，并非纳粹主义影响了侯赛尼，而是二者虽然文化出发点不同，但是共同的利益和意识形态让二者走到了一起。里宾特洛普（Ribbentrop）也支持这个说法，因为在对犹太人的立场上，侯赛尼自己的见解符合纳粹德国的观点。

1943年11月5日，侯赛尼在柏林伊斯兰研究中心的另一次演讲中，讲述了布鲁丹演讲的另一个版本。当时正临近纪念发表贝尔福宣言的“贝尔福日”。纳粹又在德国转播了这次演讲，并在德国和阿拉伯地区广播演讲的德语版本。美国驻开罗大使馆的美国人录下了这次讲说。侯赛尼的贝尔福日柏林演讲再次成为伊斯兰传统中的另一个权威文本，但这次面对的是叙利亚布鲁丹400个听众之外更广大的德国和全球听众。

侯赛尼再次表达了他对犹太人以及帮助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英国人的憎恨。他说，很久以来犹太人一直令世界饱受折磨，一直以来就是阿拉伯和伊斯兰的敌人。“他们寄生在人群中，吸人血、夺人财、败坏道德却还要求拥有居民权利。这一切使得世界敌视犹太人，犹太人由此敌视各个民族，两千年来一直如此。”他说“可兰经中提到上帝的怒火和对犹太人的诅咒”，原因在于犹太人恶劣的品行。犹太人一直“令世界饱受折磨，一直以来就是阿拉伯人和伊斯兰的敌人。可兰经这样描述这个宿敌：‘你将发现，对穆斯林信徒仇视最深的是犹太人。’他们企图败坏伟大神圣的先知。他们抗拒先知、充满敌意并诡计多端。1300年前就是如此。犹太人从未停止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阴谋诡计。”

在布鲁丹演讲中，侯赛尼声称20世纪当代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行为，反映出想象的犹太人长久以来对穆斯林的敌视。犹太人是中东“破坏伊斯兰政权的根本所在”。他们想要占领阿克萨清真寺等伊斯兰圣地，想要“建立废墟上的神殿。”他说“负责的犹太领导人的官方文件和报告”都确认了这个计划，但他并未引述任何确认此计划的人。

虽然在巴勒斯坦存在一个犹太国家也许对全人类来说是危险的，而对于阿拉伯和穆斯林人来说更为危险也更重要。这个犹太国家可能成为亚洲与非洲国家内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之间的障碍，就像一把血淋淋的刀，扎在阿拉伯国家的心脏上！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共和国将会给阿拉伯国家和中东所有国家带来遭受犹太经济剥削和犹太世界阴谋的危险。

侯塞尼接着又一次提到“犹太复国主义的秘密文件”，但他并没有对内容进行引用。他们曾证明说以色列王国将横跨地中海与波斯湾的广大空间进行，除了巴勒斯坦外，（上述王国）将包括黎巴嫩、叙利亚、外约旦、伊拉克、沙特王国以及埃及王国的部分领土。犹太人将圣城麦加置于最大的危机之中，抢夺阿拉伯及伊斯兰人土地上的果实，而这些土地是阿拉伯及伊斯兰人历经13个世纪的浴血奋战保卫下来的。

侯塞尼指出，犹太人建国不只使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处于危险之中，还危及沙特圣城麦加。正如他 1937 年在布鲁丹所做的，侯塞尼使世俗、政治的领土争端升级为伊斯兰教与犹太教之间的神学冲突。他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上的冲突转变为全世界百万犹太人和数亿穆斯林之间的宗教冲突。他与一起流亡的同伴告知阿拉伯人，同盟国的胜利就是犹太人的胜利，也就意味着阿拉伯人的失败。这种说法广为流传，因此很多人将二战的爆发归咎于犹太复国主义。

他们提供了清晰的证据将侯塞尼所理解的伊斯兰教与其执着地憎恨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联系在一起。

七、侯赛尼的长期遗留影响

从那时起到现在，伊斯兰主义者坚持认为伊斯兰教天生就是反犹太教的，这种与生俱来对于犹太教和犹太人的憎恨都与《古兰经》和《圣训》中的那些经典文本相关。如我们所见，根据布鲁丹文献记载，侯赛尼于 1941 年将这些信条带到了柏林。

这些信条和对盟军及犹太复国主义决不妥协、强烈反对的立场构成了他和希特勒合作的基础。

纳粹政权的档案文件明确记载，不仅希特勒，德国外交部、宣传部、纳粹党卫军国土安全办公室官员以及在北非作战的德国军方军事情报员，都很高兴地知道有一种既非基督教也非欧洲传统、有明显理论基础憎恨犹太人的伊斯兰教。

对侯赛尼和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伊斯兰主义者而言，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世俗政治斗争和反犹太人的宗教斗争是分不开的。从完全不同的文化和思想的这个第一前提出发，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在叙利亚布鲁丹和纳粹柏林同时出现。纳粹政权中的希特勒和希姆勒都对他们所理解的伊斯兰教表现出一种仰慕，这种伊斯兰教是与基督教和平主义潮流相反的战争宗教，且这种宗教与他们一样敌视犹太人。

二战后，侯赛尼在埃及和巴勒斯坦收到英雄般的欢迎，1946 年，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创始人哈桑·巴纳（Hassan al-Banna 1906-1949）公开称侯赛尼是“在希特勒和德国帮助下挑战一个帝国和犹太复国主义的英雄，尽管德国和希特勒不在了，但侯赛尼会将斗争继续进行下去。”而哈桑·巴纳以及他的兄弟会成员均对侯赛尼与英国的斗争经历以及他与纳粹的合作十分敬仰。这也是阿拉伯高等委员会（Arab Higher Committee）和巴勒斯坦人民党（Palestine People's Party）1945 年选举侯赛尼作为领导人的原因。1948 年，阿拉伯巴勒斯坦战败后，侯赛尼政治命运没落了，但他在部分阿拉伯和巴勒斯坦国家仍广受爱戴。他与纳粹合作的证据或被遗忘、忽略，甚至以反殖民主义联盟的正当理由、而非反对共同敌人的思想意识为借口而得到原谅。

再次强调，侯赛尼的历史重要性不是因为他在决定欧洲大屠杀中所起的作用，而在于他与纳粹德国合作未能成功赢得北非和中东战争，并将屠杀延伸到这些地区的犹太人民。

如此，他创造了其影响力最大也最为持久的遗产。既通过创作一些伊斯兰传统的规范文本，同时结合欧洲及伊斯兰教徒对犹太人的憎恨等元素。他还因此形成了绝对而不妥协的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后来的反对以色列国的传统。

侯赛尼作为理论家的影响和他的政治角色一样重要且有破坏性。早年流亡纳粹德国之前和流亡期间的文章揭示了真正的侯赛尼，他既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也是对伊斯兰教做出影响重大解读、并用反帝国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世俗语言创作的人。

他的目标，首要是北非和中东的犹太人，最后才是以色列。他们都是他巨大仇恨和庞大政治能量的目标。在传播犹太国将威胁到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这一谎言上，侯赛尼起了重要作用。

尽管在战时的柏林，侯赛尼并非决策制定者，但在战后的中东他却是如此。在这点上，鲁宾和施沃尼茨对他在 1948 年战争及战前各种事件中毁灭性的影响做了比较令人信服的解释。他们在提到侯赛尼个人领导力的影响，以及他绝不向犹太复国主义者让步的决心，煽动其追随者使用暴力“以及来自煽动公众舆论的伊斯兰主义者和民族主义极端分子的内部压力。”

虽然承认来自其他群体的压力使得 1948 年战争不可避免，1948 年战争和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也许完全不会发生“没有侯赛尼和他的盟友...除了他没有谁更可能制造这种结果...没有侯赛尼作为巴勒斯坦阿拉伯和跨国伊斯兰教徒领袖，也会有其他人出现。并且侯赛尼有纳粹提供的财力和武器支持...一旦侯赛尼将自己重新确立为巴勒斯坦阿拉伯的绝对领导人，这就可以确保不会考虑其他妥协性选择，如分治，或“两国共存解决方案”，同时可以肯定的是，阿拉伯领导人将会受到威胁而被迫参与战争。

我们无从得知，如果 1948 年战争关键的前几年及战争期间侯赛尼缺席的话事情会如何发展。毕竟，他也是 1948 年众多阿拉伯领导人中选择战争而不是分治和妥协的人之一。

我们知道他极力反对妥协，他也有手段、武器和兵力在战后巴勒斯坦按他的意愿行事。他在与纳粹德国合作前，合作期间及合作后所表达出来的观点，从他 1937 年的布鲁丹演讲、柏林伊斯兰中心研究院演讲以及战后号召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宣战，这些都表明他将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上居住的所有或绝大多数犹太人赶走的决心。这一政策只有通过阻止犹太建国的战争才能实现。

和平解决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一个前提条件是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拒绝反动的伊斯兰政治神学，而侯赛尼是这种政治神学的始作俑者。坦率且充分承认他与纳粹德国合作的历史应该是这种看法的一部分。2015 年秋，巴勒斯坦领导人再次利用以色列威胁到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这一谎言。按照对他们有利的

原则发表这些声明，明显证明侯赛尼与纳粹德国合作的起源、本质和后遗症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政治文化元素的持续影响。

作者：杰弗里·赫夫，马里兰大学帕克分院历史系著名教授，曾在《现代德国史》上发表《纯粹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宣言》（耶鲁大学出版社,2009）。他的新作《向以色列不宣而战：东德和西德激进的左派, 1967-1989》即将于 2016 年春于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